

为什么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

□ 陈 佳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 and 先手棋,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

从根本上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进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对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到2023年的约33%,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最高时的10%以上降至目前的1%左右,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95.3%。我们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对我国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自觉把握,是有实践基础的。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从需求看,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其中有4亿多中等收入人群,我国商品零售额即将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今后还有稳步增长空间。从供给看,我国基于国内大市场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能够促进全球要素资源整合创新,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最大化发挥。只要顺势而为、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条件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塑新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不是被迫之举和权宜之计。而准确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最本质特征、重要前提和保障等内涵与要求,有利于我们从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高度进一步认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



意义。

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要推进深层次改革和强化政策引导,着力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完善硬件和软件、渠道和平台,夯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基础。

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出现了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了变化。劳动力成本在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自主创新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明确路线图、时间表、责任制。

充分利用和发挥、不断巩固和增强市场资源优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既要持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又要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增强我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竞争力,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也是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比例关系健康的关键因素。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接续推动脱贫摘帽地区乡村全面振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坚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联结点。适应人民群众需求变化,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切实保障劳动者待遇和权益,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坚持问题导向,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把握好开放和安全的关

系,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增强在对外开放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促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总而言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能够凭借稳固的国内经济循环吸引全球要素资源,还能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从而推动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助于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增强公共安全保障能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因此,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对形势的深刻洞察和审慎考量所作出的重大决策。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韩非的“大小之辨”

□ 郑宁波

对大小及其关系的认识即“大小之辨”,是哲学思想中的一个命题。在先秦时期,很多主流学派触及过这个命题,如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都就此提出过自己的观点,而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大小之辨”也颇具特色。

《韩非子》若干篇章涉及“大小之辨”,有的直接论述,有的间接触及,有的则是大小问题的变形,即表面上用的是轻重、强弱等概念,实际上言说的还是大小问题。概言之,韩非的“大小之辨”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大小具有独立性,两者各有自己的内涵,大就是大、小就是小,两者之间存在对立关系。韩非举例道,晋国的智伯准备攻打仇由国,但仇由国的道路异常艰险,无法通行。智伯拟将一口大钟赠予仇由国,仇由国的国君非常高兴,准备修路迎接大钟。仇由国大臣亦章曼枝諫曰,赠大钟本来是小事侍奉大国的礼仪,现在大国以大钟赠予小国,一定别有用心,它的军队会随之而来,我们不能接受大钟。仇由国国君不听,结果七个月后仇由国就灭亡了。韩非此例说明,大、小边界明晰,承担不同功能,越短便不正常,甚至会招致祸患。韩非讲,“凡人主之國小而家

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國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阐明的也是这个道理。韩非还间接地通过许由的例子揭示大小之间的对立关系。先将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受,逃到一个平民百姓家。这个平民担心许由看上他的皮帽,赶紧将皮帽藏起来。韩非评论道,连天下都弃之不要的许由,会看上一顶皮帽吗?这说明确,狭隘的小经验、小视野很难理解大抱负、大格局,大小之间存在很深的隔膜。

二是大小具有相对性,两者相互联系,有时可以相互转化。第一,大小因参照标准不同而具有相对性,相对于更大,大也是小;相对于更小,小也是大。韩非例证道:在子圉的安排下,孔子见到宋国太宰。子圉问太宰,孔子这个人怎么样?太宰说,我见到孔子后,再看你,觉得你像微小的跳蚤虱子一样。我现在马上安排孔子去见国君。子圉说,国君看到孔子后,再看你,也会觉得你就像微小的跳蚤虱子一样。第二,大小之间可以能动地转化,要给相互转化留有余地。韩非借雕刻之道说明此理:“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其中蕴含的道理是,某些

时候大事物可以变小,小事物也可以变大;但在有些情况下,大事物就无法变成小事物,小事物也无法变成大事物。言外之意,要善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给能够相互转化的情况留有余地。第三,大小之间的转化具有方法论意义,在讲究“术”的韩非看来,要善于利用大小转化达到目的。韩非说,宋国的监止子与别人抢购一块价值百金的玉石,他假装失手将玉石摔坏了,给卖主赔偿了百金。然而,他修好玉石后,通过这块玉石赚了千金。即监止子通过百金的小损失换来了千金的大利益。

三是切忌因小失大。喜大厌小、崇大仇小是非非诸多观念中的一个鲜明倾向。他认为,“古之全大体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意思非常明确,全大体者是不吹毛而求小疵的。他针对因小失大举例道,楚晋在郢陵酣战之时,楚国司马子反口渴求饮,其仆竖谷阳知道子反喜欢喝酒,就向子反献酒代水,子反喝醉后,无法响应楚共王再战的命令,楚共王杀掉子反。韩非从中得出“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的认识。他认为虽然竖谷阳向子反献酒,并非因为他仇恨子反,恰恰是出于对于反的忠诚,但这种忠诚只是小忠而已。小忠不仅无

益,而且是大忠的敌人,只能导致悲剧。因此,小忠并不能言之谓忠。韩非还用“苦小费而忘大利”等话语表达对因小失大的批判,他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审视小,对小及其局限性特征看得非常透彻。他还提出“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韩非喜大厌小,但他也并非盲目排斥小,甚至主张为了成就大而接纳小、关注小,如“小信成则大信立”“千丈之堤,以螻蚁之穴溃”等。这些观点审时度势,颇有战略性。

韩非的“大小之辨”,既受其所在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又呈现出对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超越性。他能够客观地厘清大小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既推崇崇大、否定因小失大,又不盲目排斥小,可谓思想灵活、独树一帜,丰富了“大小之辨”的思想内涵,迄今仍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红藏》：打开品读红色进步期刊的一扇窗

□ 陈 俔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文献中心的二层,两个大书架满满陈列着百余种红色进步期刊,从《新青年》《每周评论》到《群众》《共产党人》……这些期刊是湘潭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一套珍贵的大型影印原始期刊丛书——《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以下简称《红藏》)的组成部分。每册丛书以红色布纹材料制作封面,上面印着醒目的“红藏”两字,两字均提取自毛泽东的书法。其中,《红藏》中的“藏”,读“宝藏”的“zang”而不读“cang”,寓意这套丛书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宝藏。

这套丛书收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含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党的早期各级组织以及外围组织)直接或间接创办的红色进步期刊151种,共计428册3亿余字,丛书的出版顺序基本按刊物的创刊时间先后,图文并茂、原汁原味地呈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时期、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各个阶段的红色进步期刊,覆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史料抢救工程。由于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之中,很多刊物存在时间较短、分布零散,且受技术条件限制,缺乏良好保护,部分刊物已遭受损毁和破坏,丛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克服了这些客观因素,广泛搜集红色期刊、详细甄别版本类别、补全文章的缺失内容,对史料进行综合汇总,使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红色进步刊物焕发新生。

翻阅这些第一手历史资料,仿佛看到了那段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峥嵘岁月,感受到红色进步期刊中蕴含的重要思想力量。从五四时期前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红色进步刊物成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和文化阵地。例如,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在中国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同时,第6卷第5号也被轮值主编李大钊定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集中刊登了多篇专门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另外,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分别被刊登在《向导》《中国青年》刊物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面临生存发展难题的情况下,红色进步期刊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深入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动员。例如,为解决物资匮乏问题,1933年春至1934年6月,《红色中华》等刊物配合中央苏区经济动员发起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减少伙食费等节省运动以及春耕运动、借谷运动,并开展设置阶段目标的连续号召,开展节省经济的革命竞赛等形式,掀起了活动热潮,为在经济封锁的恶劣情况下充分挖掘经济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红色进步期刊积极传播民族团结意识,鼓舞人们坚定抗战必胜信心。面对侵略者大肆制造的民族分裂舆论,《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纷纷发表文章予以回击,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国家领土主权意识、爱国主义精神、民族历史认同的文章。其中,《解放》发表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作品,有力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谬论,拨云见日指明了战争的前途,坚定了全民抗战的决心信心。解放战争时期,红色进步期刊努力传递真实的声音,为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赢得民心。《青年知识》《群众》等刊物刊发了一系列真实战况、揭露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的内幕的文章。同时,《文萃》转载了毛泽东与斯特龙的谈话,毛泽东发表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等著名论断,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信心。

《红藏》最独特的价值在于其收录了多种重要革命历史文献的完整可靠的原始文本。一方面,这是我国对新中国成立前的红色刊物进行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整理。此前,尽管有关部门和单位曾对进步期刊进行过收集整理,但如《红藏》这

样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系统地、大规模地集中影印出版红色进步刊物,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另一方面,丛书中的多数刊物是1949年以来首次整理重新出版,其中部分刊物是第一走出档案馆、图书馆特藏室,公开与读者见面。例如,创办于1923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份以“党报”为名出版的中央机关刊物,主要刊载党内文件、报告,当时发放的范围很小。1926年至1930年间,党中央主办了党内机密政治刊物《中央政治通讯》,主要传达党中央的决议、政策,每期只出14份,也只在党内小范围传阅。《党的工作》创刊于1936年6月,这是一份在当时建议每个干部必读的刊物,但由于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不久,面临纸张、印刷等困难,这份刊物印数较少、留存至今的更少,许多专业研究者对其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面。此外,1928年1月创刊的文学刊物《太阳月刊》仅出7期,各地存刊罕见。这些刊物的统一整理、公开出版为研究者们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等提供了文献基础,填补了诸多研究资料的空白,为进行多种角度的历史研究和文化透视提供了重要帮助。

《红藏》是一座内容极为丰富的红色资料宝库,为党校教师和学生学习贯彻党史、研究党史,探究党史中蕴藏的精神密码打开一扇窗,值得大家反复品读。

